



上海出版基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

3

语文教育卷

于漪全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出版基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s

3

于漪全集

语文教育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仍然关注要备好课



20 世纪 80 年代, 与青年语文教师备课研讨



作完报告后,为与会教师签名



2015年,参加“新教师宣誓仪式暨尊师重教纪念碑修缮揭幕”活动

出版说明

《于漪全集》是基础教育领域首部特级教师的全集，也是上海教育出版社为特级教师出版的第一部全集。它的出版，对于传承、弘扬和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于以教育自信创建自信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于漪全集》收录了于漪在不同时期发表于全国各类期刊和出版于多种图书的论文、讲话、序跋等作品。难免挂一漏万，故对写作时间和文章出处不一一注明，留待日后修订逐步完善。同时，对原发期刊编辑部、图书出版单位一并致谢。

全集由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组织有关教师、专家编辑。于漪的教育思想植根于教学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和生动阐述。有时一材多用，是为了从不同角度阐释相关问题，为读者呈现丰富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思考成果。

全集以“一辈子学做教师”为线索，根据文章内容，共分8卷21册，从基础教育、语文教育、课堂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教师成长、序言书信、教育人生八个方面多维度展现于漪来自教育第一线的理论研究成果，力求树立当代教育家的典型形象。

目录

我的语文教育观	1
我的语文教学追求	43
在坚守中创造精彩	74
目中有语法,胸中有中学师生	
——对建立新的语法体系的要求	76
既教文,又教人	82
“答客问难”之追求综合效应	85
爱这多情的土地	94
要敢于向轻车熟路告别	97
语文课堂教学改革漫谈	100
在美的世界里	111
祖国语言美不胜收	116
建造母语教学的辉煌殿堂	119
走进新课标	127
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浅探	143
谈谈语文教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52
谈素质教育背景下的语文课堂教学改革	166
中学语文教学的回顾与前瞻	179
实事求是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的规律	
——在“中学语文教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186
育人之妙,存乎一心	191
关于语文教学目的的思索	198

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	204
怎样进行德育和美育	214
也谈“模糊理论”与语文教学	226
要重视文化背景	230
熏陶感染塑心灵	232
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	
——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	239
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	248
语文是进行素质教育最有效的一门学科	256
语文教学应重在创建与发展	262
关键在于树立现代语文教学观念	272
语文教学观念的更新	275
对中学语文教学现状及实施素质教育的认识	277
我们面临的教改实际是什么	282
澄源正本 提高实效	285
“发展智力”略说	290
积极改革才能开创语文教学的新局面	292
研究一点语文教学理论	297
引导学生学会学习语文	299
兴趣是学习的推动力	311
“逐渐去扶翼,终酬放手愿”	319
兴趣·感情·求知欲	322
启发学生神思飞越	328
把握记忆的支撑点	334
引导学生打开认识的窗户	
——谈语文教学中的观察训练	342

在口耳上下功夫	
——谈听说能力的训练	349
中小学语文教学要衔接好	358
机械操练何时休	362
标准化试题把语文教学引入了“死胡同”	366
要练在点子上	370
难易适度 改革创新	376
喜看初中语文教材突破性进展	378
语文教学漫谈	385
思维才有力量	392
解放思想,释放语文教学的活力	397
语文教学现状的思考	402
期待语文教学的美景	
——致“中国语文教育高峰论坛”的书面发言	419
功夫要用在融会整合上	422
立足于学生的发展	
——对新修订的《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粗浅理解	426
期待着精益求精的好教材	436

我的语文教育观^①

今世界上有四种教育家：一、政客教育家，借教育以图政治上之活动；二、空想教育家，有空想而未能实行；三、经验教育家，以经验自居，不肯研究理论；四、科学教育家，则实用科学以办教育者。中国现在教育家只有政客、空想、经验三种，但教育以科学教育为最重要……

（《师范生应有之观念》，《陶行知全集》第一卷）

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的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第一流的教育家》，《陶行知全集》第一卷）

以群星灿烂、流派纷呈的人类教育史来验证陶行知的这段话，我们确实发现，古今中外所有留名史册的一流教育家都几乎具有这样的共性：他们从来不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闭门造车、空谈教育，也不是囿于个人之局部经验而沾沾自得，而是在实践中去思考、去发现、去探索科

① 本文收入《于漪与教育教学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全面总结了于漪的语文性质观、教学观、大语文观、兴趣说以及语言与思维训练核心说。这五方面内容互为表里，贯串了于漪“教文育人”基本思想，是于漪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基本特征是，既立足于民族文化，又拓展着世界视野，反映了现时代的中国语文教育规律和特性。

学的教育规律,最终在理论上有所建树,逐步构建起他们的理论体系。在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后来的夸美纽斯、赫尔巴特、杜威、苏霍姆林斯基等,在中国,从孔子到蔡元培、陶行知、叶圣陶等,他们无不以自己诲人不倦的教师生涯作为积淀,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改革创新,诞生了他们的教育理论,最终卓然自成一家,从而在教育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

上述巨人的光辉形象,从我成为教师的那一天起,就深深烙在我的心头,我决心以他们为榜样,作为我的终生追求,尽管高山仰止,但我永不停步。因此,我从扎着小辫开始耕耘在绿意葱茏的教育园地,始终勇于实践,但绝不停留在实践,如此走过了60多个实践探究和理论创造并驾齐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50多年语文教育第一线的教学体验,十几年苦心经营当校长的管理经历,始终不懈的实践、学习、探究与创造,给了我自信和胆量,使我不因袭旧说,不追风逐浪,不人云亦云,始终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思考与发现,提出了具有当代中国色彩的教育教学理念,为我国的教育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能够引以为豪的是,60多年的长途跋涉,自己能够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思想,从探究语文教育的本质出发,把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现代研究新成果融进自己的教育实践,孜孜不倦地追求崇高的学术境界,不断求索语文教育的规律,在扬弃和开拓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语文教育特色与体系。我之所以能取得些微末成绩,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一、人文说:我的语文性质观

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自百年前语文独立设科以来,一直认识不一,众说纷纭。作为语文教师,多年来我始终在思考与探索这个问题,我深深知道,这个问题不解决,语文学科就难以确立自己的正确方向,

就难以真正健康发展。我当然赞同语文界众多同行提出的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征,但我始终认为,语文仅仅作为一门工具是远远不够的。语文有着那么丰富的内涵,能够在那么宽广的范围内给学生以影响,怎么能仅仅是工具呢?随着思考与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我的全面育人观的逐渐成熟,我终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明确而相对完整地提出了语文学科的“人文说”。

1. 语文学科“人文说”提出的意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教育无疑充当了社会教化的重要角色,然而,语文教学却未能单独成科,也就是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概念。古人还没有今天这样自觉的学科意识,也就无从谈论对于学科性质的思考。到了近代,随着西学的引进,“新学制”的颁布,语文学科的独立意识开始形成,语文单独设科,课时有了限制。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办教育”,努力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图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而,西学在引进的过程中,明显带有重自然科学,轻文史哲,重实用、轻素质的重“术”轻“道”倾向。语文的学科地位实际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1949 年后,教育的发展一直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语文教学不仅难以幸免,而且首当其冲。在政治教育的强势影响和冲击下,语文学科逐渐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失去了自己独立的“科格”,为意识形态所左右,成了变相的政治课。其间也有过数度短暂的“峰回路转”。例如,1956 年实行汉语与文学分科教学,试图把语文教学纳入科学轨道。但由于这种教材与教学本身存在的某些缺失,加上认识上的误区,在这段时期,教育界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和争辩,并郑重地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工具说”。于是,分科教学于 1958 年暑假前被勒令停止,课程设置又恢复到综合型的“语文课”。20 世纪 60 年代初,强调抓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所谓“两

基”训练)。

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的春天降临。中学语文教学领域涌现出一大批锐意改革的教师,语文教坛出现了拨乱反正、百家争鸣的喜人形势。然而,没有多久,应试教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来了“标准化试题”。于是,原本就处主导地位的“工具性”,与新生的“标准化试题”一拍即合,使得语文教育愈益失去鲜活的水分和生机,完全降格为一门工具性、技术性的课程。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淡薄,语文素质与能力明显下降,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焦虑。

20世纪80年代后期,升学考试指挥棒对语文教育的“指挥”力度越来越大,影响所及,甚至到小学低年级。问题的实质在于:操纵这根指挥棒的是只无形的手,那就是语文教育观念。由于急功近利思想和实用主义的干扰,学校教育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受到影响,把本作为检测手段、选拔手段的考试推向不恰当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重知识技能技巧,轻对学生总体素质的培养。语文教育的准星也发生了偏差。在片面的语文教育工具化思潮的冲击下,阅读教学“不闻读书声琅琅,但见习题如海洋”,见段不见文,见层不见段,文章肢解得面目全非。作文教学套路一套又一套,模式翻新又翻新。名曰量化、科学,实质语文教育内涵的人文精神因人为的缘故而流失。躯壳在,灵魂失,教师迷茫,学生更是不知所措,兴趣大降,语文水平提高受挫。

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针对现实状况,我们广泛学习国内外母语教育的有关文献,从自己的教学实际出发,提出语文教育的定位问题。我发表了论文《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论述了我对语文学科性质的看法,明确提出语文教育和教学具有“人文性”特点,形成了当时激起巨大反响的“人文说”。我明确提出,语文不但有鲜明的工具属性,而且有鲜明的人文属性。语文教育的基本特点应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这个工具;舍

弃人文,就无法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弘扬人文,不是照抄过去,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出新,赋予它时代的精神。今日的语文教育要有中国特色,就要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就要有面向 21 世纪的浓郁的时代进取精神,变语言形式教学的单一功能为知、情、意教育统一的多功能,变低效率为高效率,尊重和发展学生的个性,探索与现代教育技术结合的途径。变语文自我封闭性为开放性,开发语文教育空间,面向生活,面向社会,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不用机械训练消磨学生的青春。我对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目的在求得语文教育健康发展,使万千学子深受其益。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在报刊上、在多种场合反复阐述这一观点。这一“人文说”的提出,在语文教育界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语文教育领域关于语言与语文、语文学科性质的新一轮深入的探讨,并使这场讨论最终在“人文性”上达成共识。有同志说,我关于语文学科的“人文说”,已经并且还将对中国的语文教育和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2. 语文学科“人文说”的形成过程

其实,我这“人文说”思想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它有着近 20 年的思考进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日趋成熟,其间经历了三次大的进展和突破。

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翻开 1984 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专著《语文教苑耕耘录》,其中《熏陶感染塑心灵》《兴趣·感情·求知欲》《既教文,又教人》等几篇文章中,我就多次这样强调:

教师每教一篇有意义又有价值的作品,都要……开辟思维的蹊径,领着学生与文中高尚的人、高尚的思想反复接触,领受教育和感染……

把思想教育渗透到教学之中,与语文训练有机结合起来,力求做到水乳交融,使学生思想上受教育,感情上受熏陶,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获得提高……

若离开词句篇章去讲析一篇文章,文章的精髓就失去光泽,失去育人的作用与威力;分析推敲词句篇章,若不充分阐发其表达的情和意,就显示不出语言文字的精到佳妙。只有两者紧密结合,既废除架空的说教,又力戒支离破碎的诠释,把思想教育渗透到语文训练之中。在语文教学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绝不是削弱语文能力的训练,而是更有效地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可见,那时我已经开始认识到,语文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认知与思维的工具,但不能把语文课简单地归结为工具课,必须充分重视语文学科的思想性。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始思考语言与语文的文化内涵,阐释语文教学中综合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的教育目标及其关系。我在1988年发表的《素质·能力·智力》一文中有如下表述:

语文教学根据学科的特点,须引导学生在素质、能力、智力等方面扎下深根。现代人应该是文明人,有良好的习惯,有奋发的精神,有追求真知的旺盛求知欲,有克服困难的意志与毅力。这些素质均可以通过严格的语言训练进行培养……

语文教学之所以能在学生素质、能力和智力方面发挥重要的培育作用,首先是由语文学科的性质决定的。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和思想性。

从这样的表述中能够发现我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较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有了明显的发展:第一,将问题的思考从培养目标中分解开来,明确提出是对“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学科基本特点”的思考,思考的对象更清晰、更明确了;第二,在阐述语文教学多重功能的时候,着重提出了“素质”“素养”的问题。尽管当时对学科性质的认定还没有突破“工具性和思想性”的原有框架,但就所阐述的“思想性”的内涵而言,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

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一文的发表为标志,我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思考,经过近 20 年的不停追问、学习与反思,终于有了创造性的突破。这是我在自身学术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跨越,为自己的语文教育理念打下的坚实地基。有了这个关于学科性质的根本性的思考和发现,对语文教育教学其他问题的思考和阐释,就有了原点和强有力的支撑。以下这段文字,可以看作《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主旨的论据,也是整个“人文说”的理论支柱。

给语文教育定位,先得给语言定位,给汉语定位。长期以来,语文教育界强调语言的工具性,这无可厚非。然而,它绝不等同于一般的生产工具,如机器或犁锄;也绝不等同于一般的生活工具,如筷子或拐杖。语言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信息的载体。……问题更在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是一个符号体系,而且是该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符号因意义而存在,离开意义,符号就不成其为符号。就是说,语言不但有自然代码的性质,而且有文化代码的性质;不但有鲜明的工具属性,而且有鲜明的人文属性。

应该说,“人文说”的提出,不仅适逢其时,而且,对于长期执迷于“工具论”的语文教育与教学来说,还有着一层“拯救”的意味。把语文学科单纯视为“工具学科”,等于关闭了本可充分展示人的丰富精神世界的精彩窗口,致使一门活跃着“人气”的学科,变得匠气十足。“人文说”的提出,正是要使语文教育和语文教学失落已久的这种“人气”重新归复。“人文说”所阐发的人文精神,既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文思想,也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思想。因此,“人文说”的提出,不应仅仅看到这是一种语文教育与教学的新学说的面世,还应该看到在它的深层,有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事业的责任感和对未来社会进步繁荣的热切期望。总之,“人文说”是我向当今教育贡献出的一颗赤诚之心。

继《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之后,我连续发表了《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进行素质教育最有效的一门学科》《语文学科是一门实用而多彩的人文学科》《语文学科是一门多功能的育人学科》等一系列长篇文章,密集地阐释语文的“人文性”。这些文章展示了丰富的理论内涵。

总之,从语文学科具有“思想性”到语文学科具有“人文性”,我自己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比较倾向于语文教学工具性和思想性的结合,到了 80 年代中期,我感到“思想性”的提法对语文教学有局限,“思想性”不能涵盖语文学科的丰富和多彩。因为有许多内容除了具有思想性,更具有道德的、情操的、审美的特征。过分强调语文教学的思想性,容易给极“左”思想有可乘之机。直到 90 年代,我才明确提出“人文性”。这说明,我对学科性质的认识确实是不断反思、不断深化和不断提升,而逐步走向成熟的。这是一个长达 20 年之久的探索历程,堪称一次历经艰辛的远航。

3. “人文说”的内涵

关于“人文说”的具体内涵,我主要从以下方面加以阐述。

一是从理论上阐述了语文学科性质在整个语文学科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以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对学科性质的重视、思考和认识。前面说过,中国漫长的教育发展过程中,语文学科教育的概念不过始于近代,语文学科教育的理论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完全是零散而不成形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论之所以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与语文教育工作者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地位认识模糊不无关系。于是我在《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一文中首先强调了明确学科性质的重要性:

教学行为受教育观念支配。群体性的教育行为,往往受到某种思潮的教育观念的支配。语文教育观念是对语文教育诸问题的看法……教育观念附着于教育者脑中,形成心理定式,有意识地或不完全有意识地指挥着教学行为。在语文教育观念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是性质观,它统率语文教育的全局,决定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由此而引发出目的观、功能观、承传观、教材观、教法观、质量观、测试观、体制观等一系列观念。

在这段论述中,我试图突出强调两点:第一,教学行为是受教育观念支配的,教育观念附着于教育者头脑中,形成心理定势,有意识地或不完全有意识地指挥着教育者的教学行为与教学实践;第二,在语文教育的观念体系(理论体系)中,语文教育性质观是最为核心的观念,它决定并引发出目的观、功能观、承传观、教材观、教法观等一系列观念。因此,我们必须从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两个角度去正确认识学科性质,正确把握学科性质。

二是我试图从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角度分析立说,使语文学科性质的“人文性”一说,具有更加厚实的学理底气和无可置辩的